

# 爲甚麼不是「史學與哲學之合」？

● 劉 東

## 旁觀者的看法

對於第八期《二十一世紀》，我們這裏的朋友最感興趣的話題，當然是何炳棣先生的那一番小題大做。要從學理上扣，他從這麼小的一個字眼入手，不顧陳榮捷後來有關清儒已有此說的提示，居然推得杜維明學風不正，並殃及整個新儒學，其間的邏輯跳躍可謂大矣，竟和他往常考釋人口和土地問題時的縝密風格適成反比。更何況，他居然引證了梁啟超和陳寅恪來批評別人對歷史文本的創造性闡解，這就更叫人想不通了。其實，梁和陳不僅沒有這般狹隘，反而竟可以說是他所抨擊的那種學風的自覺倡導者。

所幸的是，在參考了其他材料之後，我們從那番批評背後還能讀出幾分道理來，那便是「史學與哲學之爭」。不管何文中顯示出怎樣狹隘的「史學的傲慢」，也不管那後面有多少我們猜度得到或者猜度不到的意氣和情結，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哲學，畢竟也還是能夠看出一些問題，那便是

任何一個學科包括哲學都會具有的自身局限性。

我猜想，屬於新儒學營壘的學者會起而反唇相譏。我也渴望讀到這方面的文章。不過，問題的癥結似還在於，如果哲學家 and 史學家都以己之長去護己之短和攻人之短，那麼，轟轟烈烈的論辯過後，除了繼續傷和氣之外也未必見得會有甚麼進境。所以我想，在這方面貢獻幾分旁觀者的清醒，也許是必要的。

## 文化保守主義的課題

其實，無論論辯雙方把彼此的鴻溝看得多麼深，他們照我看來還是同屬於一個更大的派別，即「文化保守主義」。只不過，由於他們隸屬的學科不同，下力的方向也就自然有所側重。「新儒學」這個名稱之所以引起了人們的認同和不認同，其要害就在於，大家都有意無意地認定它是一個基本上專治義理之學的哲學派別。明乎此，圍繞新儒學所發出的種種議

如果哲學家 and 史學家都以己之長去護己之短和攻人之短，那麼，轟轟烈烈的論辯過後，除了繼續傷和氣之外也未必見得會有甚麼進境。

論，實際上並不難澄清。因為，說到底，問題並不在於新儒學有沒有成績（這一點叫我看來毫無疑問），也不在於新儒學有沒有局限（這一點叫我看來也毫無疑問），而在於它的成績和局限是必然地連在一起的。換句話說，由於新儒學大致上是一種主要關心價值層面的文化保守主義，所以它的長處也恰巧同時就是它的短處。

此話怎講？面對「五四」以來新文化的衝擊，一切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實都遇上了一個共同的難題，那就是在傳統業已破落的情況下又努力去傳承並恢弘它的大統。那麼，這個工作從何入手呢？當然學者會有各種各樣的選擇。但無論如何總得承認，深入思考歷史經驗中或隱或顯的價值取向，把華夏文明系統中的精神內核剝離出來，畢竟是一個具有優先性的課題。由此而論，新儒學正可以說是應

運而生的。儘管從哲學學科內部來評判，它把心學一系奉為唯一正統的做法還大有商量的餘地，但無論如何，它畢竟把對於傳統文化之深層價值理念的討論大大地精細化和系統化了，以致於此後人們只要還想在這個方向上更進一步，都只能努力去越過它，而不能繞過它。當然，為了把問題認識得更全面些，即使「求全責備」也未必見得不好。只是，同時也別忘了，還是應先指出人家做了甚麼，而不是沒做甚麼。

## 新儒家的貢獻

照我看來，新儒學的功績所在，乃是它在已被世人看作一片空虛的傳統中，傾全力去搶救出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性。從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立場出發，這樣做既是重要的，又是明智的。打個比方，這正是拉卡托斯講的那種不受其他假說侵害的（充其量只能萎縮）基本內核。由此，無論儒家文化受到了現代性多麼大的挑戰和摧殘，通過新儒學的開掘與張揚，人們總算還是保守住了並不比其他精神傳統遜色的中國獨有的精神傳統，從而為現在和今後的文化批判工作保守住了一個可貴的價值支點，從這個意義上講，能否由「內聖」徑直開出「外王」，畢竟是「第二義」的問題。要知道，即使未能馬上派生出它的有形外殼來，一種精神傳統仍然可能不失其偉大和可貴。更何況，照我看來，「政教不分」正是過去歷史上有待克服的現象，它既未能在「學統」和「政統」之間保持足夠的緊張以推動制度層面的進步，又很容易使人們在「政統」暴露出歷史有限性時把「學統」和嬰兒的

通過新儒學的開掘與張揚，人們總算還是保守住了並不比其他精神傳統遜色的中國獨有的精神傳統，從而為現在和今後的文化批判工作保守住了一個可貴的價值支點。

圖 新儒學的功績所在，乃是它在已被世人看作一片空虛的傳統中，傾全力去搶救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性。



## 歷史學家之長

當然，話說回來，作為文化保守主義的一支而非總體，新儒學再重要，也不可能把握住整個中國文化的精義。在學術的不斷進展中，它勢必要招致兩類批評，其一來自哲學學科內部，其二則來自其他學科。很明顯，這一回它是碰上了後者。平心而論，從史學的角度來批評哲學，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有益的。但關鍵在於批評者必須先弄清楚：你所指出的局限性，究竟是個別學者失誤所造成的呢，還是那個學科本身所固有的？如果是前者，那麼你就須首先把自己的身分變成專業或業餘的哲學家，這對於其他學科的學者是有一定風險的；而如果是後者，你就有可能發揮史學家的專長，講出許多很要緊的、又偏偏總難免為哲學家所忽視的問題。的確，即使撇開前一種失誤不談，哲學這門學科也決不是無懈可擊的。它那種高度抽象的視點，使得它就算能夠講出一些傳統文化中的很深刻和很本質的東西，也必然要忽略和丟棄大量豐富而生動的細節。由此，歷史簡直就變成了由邏輯必然性所推演出的乾巴巴的理念展開，而不是充滿各種偶因的敞開着各種可能性的經驗過程。毫無疑問，哲學家於此處之所短，正是歷史學家於此處之所長。同屬於文化保守主義的歷史學家，完全有理由向新儒家提出基於豐富歷史經驗的忠告，以便提醒他們——傳統符號中的有益資源，決不僅限於抽象的價值形態，還更包括具體的各個文明層面。

哲學那種高度抽象的視點，使得它就算能夠講出一些傳統文化中的很深刻和很本質的東西，也必然要忽略和丟棄大量豐富而生動的細節。

設若大家都能在充分理解、寬容和體諒的基礎上抱有虛心，我們便可以把對於傳統文化的整理工作做得更完備和系統。

## 合則兩利

我不知道：「史學的傲慢」是不是由「哲學的傲慢」惹出來的？因此，我也想像不出：這場「史學與哲學之爭」為甚麼不是「史學與哲學之合」？但我卻可以篤定地透露一點：在中國大陸，我和我的同好正試着走後一條路。不管是借用章太炎的「迴真向俗」，還是用我們的「以器證道」，或者「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借鑒年鑒學派」，總之都是指向同一個境界——把哲學和其他各門學科打通，以便還傳統文化一個更完整、更真實的本來面目。我以為，設若大家都能在充分理解、寬容和體諒的基礎上抱有這種「哲學家的虛心」、「史學家的虛心」、「文學家的虛心」、「社會學家的虛心」、「經濟學家的虛心」、「民俗學家的虛心」……那簡直是功德無量的大好事。即使退一步說，我們也可以把對於傳統文化的整理工作做得更完備和系統，既讓每一個文化因子都全息式地顯示出它所深嵌其中的那個大背景的整體信息，也讓那個大系統本身活靈活現地交織出黑格爾所謂「這一個」的千姿萬態。更何況，進一步說，當我們和我們的後人着手建構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後現代形態」乃至「後後現代形態」時，這種工作還將會一再地顯示出其超前性來呢？

劉東 37歲，哲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理論室助理研究員，並兼任「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執行主編，著有《西方的醜學》一書及學術論文多篇。